1948年3月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率领中央前委机关东渡黄河——

从杨家沟到西柏坡

■赵志行

记 史

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浴血奋战、夺取全国胜利的壮阔征程中，奔腾不息的黄河见证了我党我军的光辉历史。在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岔上镇川口村的黄河岸边，巍然屹立着一座“毛主席东渡纪念碑”，无声诉说着一段彪炳史册的革命往事。纪念碑高27米，象征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1948年东渡黄河时27年的奋斗历程。1948年3月23日至5月26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率领中央前委机关，从吴堡县川口村园则塔渡口乘船东渡黄河，在山西省临县碛口镇高家塔村顺利登岸，随后途经山西、河北等地，最终抵达西柏坡村。就在这段时间，人民解放军逐渐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。一年多后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

一

1947年3月初，胡宗南集结25万大军进犯延安，企图摧毁中共中央指挥中枢。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，3月18日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主动撤出延安。29日，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则沟村召开政治局会议，讨论中共中央的行动问题。会议最终决定：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成立中央前委，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。1948年春，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西北野战军在宜川战役中取得大捷。3月7日，毛泽东同志在《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》中高度评价这场战役“改变了西北的形势，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。这次胜利，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，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”。

此时，西北野战军顺利转入外线作战，中央前委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作战的任务已圆满完成。为了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，中央前委决定东渡黄河、前往华北。9日，毛泽东派汪东兴等人组织东渡黄河的准备工作。汪东兴接到任务后，迅速召集渡河筹备会议，商量渡河的相关事宜，并同地方政府同志商量船工、船只等问题。汪东兴经过调查，决定把渡河地点选在川口村园则塔渡口。当时，川口村的船工和船只都非常紧缺，中共吴堡县委倾力协调，从沿河两岸的水手中找到一批经验丰富、政治可靠的人员，终于解决了船工的问题。此外，吴堡县委发动周边群众积极捐献木料，渡船问题也得到解决。

3月16日，渡河演练开始。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的捣乱破坏，有关部门还专门在川口村以北的佳县木头峪、以南的宋家川等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渡河演练，用来掩护川口村的渡河工作。

二

3月21日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撤离杨家沟，道路两旁挤满了自发前来送行的陕北群众。据警卫员阎长林回忆，毛泽东对送行的群众说：“陕北人民对我们太好了，现在要离开，真有点舍不得。等全国解放了，我们一定再回来看望大家！”22日，中央前委抵达佳县，并进行短暂休整，为东渡黄河作最后准备。周恩来对汪东兴说：你发给前委的两份电报均已收悉，你们对整个东渡黄河的准备工作做得很细，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得很周到，防范措施也很得力，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很密切，配合得很好，前委对你们的工作非常满意，你们辛苦了，我代表前委向你们表示感谢。23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抵达川口村园则塔渡口。这时，渡口旁早已有木船停靠在那里，水手已做好摆渡准备。按照预先安排，毛泽东登上了木船，同船的有秘书叶子龙等人；周恩来、任弼时乘坐另一只木船。

木船行至黄河中央的时候，浪涛越来越大，冰块也越来越多。过了大约二三十分钟，船队顺利抵达黄河对岸——山西省临县碛口镇高家塔村的一处滩头。凝视着河对岸，毛泽东深情地说，陕北是个好地方。这句话，为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登岸后，毛泽东得知当地船工生活困难，当即嘱咐有关同志批给高家塔水手工会360斤边区粮票，以解群众燃眉之急。稍作休整后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率部继续前行，于当日傍晚抵达临县寨则山村，入住离石工读学校。24日，毛泽东一行到达中央后委（当时，中央后委由叶剑英、杨尚昆领导，是统筹后方的机构和前方作战的参谋部）驻地临县三交镇双塔村，与后委留守人员会合。当晚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中央机关今后行动路线问题，商定分为两路：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等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，杨尚昆等则直接前往西柏坡。随后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继续前行。26日，毛泽东到达晋绥解放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，同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、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会面，听取他们的汇报。4月4日，毛泽东到达岢岚县城，并听取关于土地改革、整党情况的汇报。随后，他们途经神池、宁武、代县等地，最后翻越五台山，于5月26日到达西柏坡。

三

“陕北过来一颗夜明星，夜里走路亮堂堂……”这首诞生于70多年前的歌谣，曾在西柏坡一带流传，至今在当地仍有人会唱。歌谣里唱的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从陕北杨家沟来到华北西柏坡。这不仅是中共中央指挥位置的空间变换，更是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跨越，使党中央能够更直接、更便捷地指挥全国的战略决战。从此，西柏坡成为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，也成为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“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”。在这里，党中央部署了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，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。
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）

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成长记

■金正貌 余海玉

军史撷珍

74年前的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，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起飞典礼吸引了国人的目光。

93岁的伍竹迪老人回忆起那天，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。有一张合影，老人珍藏了很多年，上面是包括她在内的14名年轻女飞行员。她们穿着厚厚的飞行服，表情有些拘谨、严肃。当笔者问伍竹迪是否记得她们的名字时，她指着合影上的面孔一个个说出来：周真明、周映芝、武秀梅、王坚、戚木木、万婉玲、邱以群、陈志英、施丽霞、伍竹迪、秦桂芳、何月娟、黄碧云、阮荷珍。这些年轻的面孔，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时任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提议，培养新中国自己的女航空员。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大力支持下，1951年初，空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，开始从华东军政大学等单位选拔女学员。

当时，伍竹迪正在中南航空预科总队学习。她听到这个消息后，立即向组织提出申请，并获得通过。55名女航空学员，先后进入空军第七航空学校学习。其中，包括伍竹迪在内的14人学习飞行，其他人学习领航、通信、机械专业。

伍竹迪清楚记得，从北京去航校前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对她们说了这样一段话：培养你们是经党中央、毛主席批准的，你们要珍惜这难得的机会，一定要飞出来，为新中国妇女同志争光。就这样，她们经过刻苦训练，55人全部学成，无一掉队。伍竹迪等学飞行的14个人，全都成功完成单飞。

毕业后，伍竹迪等人被分配到空军航空兵某师。到驻地不久，一个消息从北京传来。中央军委批准1952年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当天，在北京为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举行起飞典礼，她们将驾驶里-2型运输机，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。

如今，中国航空博物馆里还陈列着几架里-2型飞机。这款飞机是从苏联引进的。作为当时先进的新型运输机，它的体积更大，操作系统也比伍竹迪她们飞过的教练机要复杂很多。要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改装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14名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，后排左三为伍竹迪。 作者供图

伍竹迪告诉笔者，为了能够飞过天安门，每个人都铆足了劲。虽然训练强度大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。改装里-2型飞机是否成功，就要看在单飞时能否通过考核。然而，训练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突发状况。

黄碧云在一次起飞时，因为空中机械员过早收起了起落架，导致飞机还没有离地就突然趴在了跑道上，造成螺旋桨断裂。临近起飞典礼出现这样的情况，让本就承受重压的女飞行员们，内心蒙上了阴影。黄碧云是从空勤机械专业转学飞行的，一开始就比其他学员晚训练了1个多月。她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记录自己为了赶上战友们的步伐如何努力：“2点起床，3点上课，6点便到机场开始飞行。”在上级和战友的帮助下，黄碧云调整好状态，重新投入训练，成功完成单飞。她们14人先后完成了起落航线、转场等课目，并于2月底顺利转场到北京西郊机场。

然而，由于最终确定的编队飞行方案，是6架里-2型飞机通过天安门，每架飞机为一个主驾驶员、一个副驾驶员。这就意味着14名飞行员中，有两人要面临淘汰。大家一路走来都付出了太多努力，谁不想驾机飞过天安门广场？最终，结合她们在航校学习和改装里-2型飞机期间的综合表现，黄碧云和武秀梅两人落选。

1952年3月8日，首都各界庆祝新中国第一批女空地勤人员“三八”起飞典礼，在北京西郊机场隆重举行。7000多名首都各界妇女代表、许多国家驻华使节及夫人都来到现场，共同见证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瞬间。

在现场，朱德称赞她们是新中国妇女的光荣，并和邓颖超等领导同志亲切检阅了女飞行员队伍。邓颖超在典礼现场语重心长地说：今天的起飞典礼证明了我们妇女只要打破自卑感，有信心，有勇气，自强不息、努力学习、坚韧奋斗，我们妇女是同男子一样，一切工作都可以做。

临近中午，象征着开飞的信号弹直冲云霄，第一架飞机腾空而起。那一刻，现场的人群挥手致敬，热烈欢呼。

事实上，为了起飞典礼顺利举行，工作人员制订了严密的应急预案：在未进入首都上空，如飞机发动机发生故障，要报告塔台，同时飞至就近机场着陆，或寻找平坦地带实施迫降；要是在首都上空，飞机发动机发生故障，飞行员应尽最大努力将飞机迫降于城外。

工作人员做了充分准备，女飞行员们则凭借扎实的训练和良好的心理素质，全都顺利升空。此外，当时还有一个暖心安排，由于里-2型飞机内部空间大，此前落选的两名女飞行员黄碧云和武秀梅，当天也登上了飞机。她们虽然不能亲自驾驶飞机，但和其他12名女飞行员一起飞上了蓝天，见证着战友的壮举。同时，首批女领航员、通信员、机械师也全都上了飞机。

就这样，在新中国历史上有着标志性意义的6架里-2型飞机按照预定航线，向天安门广场上空飞去。下午1点多，6架飞机陆续平安返回西郊机场。各界妇女代表似潮水般涌向女飞行员们，为她们献花，与她们拥抱，欢腾的场面久久不能停息。

1952年3月24日下午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亲切接见了参加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飞行表演的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。毛泽东微笑着跟她们招手，向刘亚楼询问她们的训练情况。得知她们都能单独执行任务后，毛泽东高兴地说：要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，不要训练成表演员。

毛泽东同志的教诲，牢牢刻进了每一名女飞行员的心中。此后，她们飞遍了祖国各地，执行空运空投、抢险救灾、人工降雨、航空测量、科研试飞和专机运输等任务。伍竹迪在近17年的飞行生涯里，飞行时间达到4000小时，一步步成长为机长、教员和指挥员。黄碧云和武秀梅坚持苦练，继续追寻蓝天梦想：黄碧云多次执行领导人专机飞行任务；武秀梅飞行时间长达33年，曾荣立个人二等功，是首批女飞行员里飞得最久的。

雷霆玫瑰，劲舞苍穹。从1952年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，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成功接受检阅，到国庆60周年阅兵时，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精彩亮相，再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的空中梯队，歼击机女飞行员和加油机女飞行员同台亮相，一代代女飞行员接续传承“忠诚无畏、崇尚科学、敢为人先、追求卓越”的精神，在蓝天之上书写着属于她们的青春航迹。

本版学术支持：褚 银

扫码观看“揭秘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的蓝天征程”系列专题片

红色足迹

苍溪红军渡

■于德深

抵达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时，正是初春。车子沿陵江镇蜿蜒行驶，待到“红军村”的路牌出现，我的心便肃然起来。此行的终点，苍溪红军渡，就在前方。对我来说，这里就像一扇门——门外，是车水马龙的现代生活；门内，则沉睡着1935年春天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。作为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，这片热土承载的峥嵘岁月，静待后人前来回望。

步入红军渡景区，最先撞入眼帘的，便是嘉陵江。它从秦巴山地的怀抱中挣脱，至此江面开阔、水流沉静，此时还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粼粼的波光。很难想象，这片温驯的水域，在91年前的那个春夜，曾是横亘在数万红军面前、被敌军视为天堑的生死线。

我走向江边那片经过修整的滩地。这里，便是当年的主渡口——塔子山湾。如今滩地平缓，卵石温润，几艘仿制的旧式木船静卧岸边。我独自寻了块大石坐下，闭上眼，1935年3月28日的那场血战，在我的脑海中慢慢浮现。

那夜，星月无光。脚下这片平整的滩涂，当年是怪石嶙峋、草木杂乱的险滩。对岸，是川军邓锡侯、田颂尧部经营数月、碉堡林立的坚固江防。而在身后塔子山密林中的“谭家大院”里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目光，正死死锁在地图上这条蜿蜒的线上。此前，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、甘肃边界发展，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行动，决定在四川省西北部强渡嘉陵江，对国民党军展开进攻。此时，策应中央红军行动的战略决心，已化为必须实现的战术命令。

我仿佛能看见，红军的突击队员，将一种名为“毛蚌壳”的特殊小船悄然推入水中。这些船的船体小巧，行动迅捷，是由红军将士与苍溪百姓日夜赶造而成。船桨入水，轻若无声。这一夜，枪火如星，血染春江。至次日拂晓，塔子山渡口最终被红军牢牢控制。这一渡，不仅是空间的跨越，更是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的正式开端。苍溪这个古老的地名，自此和“红军渡”连在一起。

我睁开眼，对岸青山如黛，有白色的水鸟悠然掠过。那场惊心动魄的渡河，现在已了无痕迹。

离开江滩，我步入“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”。馆内灯光柔和，玻璃展柜里，锈迹斑斑的枪械、泛黄破损的文件、磨损严重的草鞋……这些实物沉默着，却比任何文字都更具感染力。其中一件打着补丁的“钱衣裳”，让我驻足良久。这是苏区妇女将苏维埃布币细心缝入衣内，支援红军的见证。一针一线，皆是民心。

苍溪红军渡（雕塑）

在复刻的“红军石刻标语碑廊”里，粗糙的石面上，凿刻着当年最直白也最有力的口号：“打过嘉陵江，迎接党中央！”手指抚过那些深刻而斑驳的刻痕，一种粗粝的触感从指尖传来，我仿佛能触摸到当年錾子与石头撞击时迸发的火花。

出馆之后，我沿着“长征路”标识的步道向上攀登。路旁松柏森森，风声过耳，如历史的呼吸。登上山顶平台，视野豁然开朗。整个红军渡景区、蜿蜒的嘉陵江、远处的苍溪县城尽收眼底。

在这里，我遇到了景区的一位义务讲解员，一个脸庞红润的本地少年。他用尚带稚气却非常认真的声音，讲述着苍溪儿女参加红军的往事。在这年轻的声音里，红色历史获得了崭新的、绵延不息的生命力。

下山时，日已西斜。临别回望，“红军渡”3个大字在暮色中渐渐隐去轮廓，而嘉陵江的波光，却愈发清晰，犹如一条银亮的道路，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，又坚定地奔向远方。

激战老木孔

■郭天民

口 述

1935年3月，红一方面军主力第4次渡过赤水返抵乌江北岸之际，我红9军团正在打鼓新场（今毕节市金沙县）一带活动。当时，我在红9军团任参谋长。一天，突然接到军委电令：红一方面军主力拟立即南渡乌江，为保证顺利南渡，决定红9军团暂时留在乌江北岸，以积极的行动来迷惑、引诱敌人，牵制敌人……

我们于金沙的马鬃岭开始行动，故意造成声势，折转向东，在湄潭一带展开活动，以吸引敌人，转移敌军对我主力的注意。军委及主力红1、红3军团乃乘机疾进，胜利渡过了乌江。军委交给我们军团的牵制任务胜利完成，但我们抢渡乌江的计划却受到了敌军阻碍。

……

渡江不成，敌已迫近，我军团顿时处于非常险恶的境地。我们当即开会，决定立即转移，离开江边。4月3日下午，部队到达打鼓新场的老木孔。部队经过急行军，十分疲劳，原想在这里稍事休息，但刚到不久，便接到侦察部队的报告，东北面发现敌人，是贵州军阀犹国才部3个团（后查明是7个团）正向西南方向追击我军。

刚刚脱离了迎面而来的敌军主力，尾追的黔军又赶到了跟前。这时应该怎么办呢？打，还是不打？我们经过研究，并下定决心：坚决打！具体打法是：集中力量伏击敌人的指挥机关，然后击溃全军，战斗发起的时机则尽可能选定在中午前后。因为这时敌人鸦片烟瘾发作，战斗力最弱。

次日拂晓，部队经过深入的政治动员后进入了阵地，在灌木丛中隐蔽起来。一直等到上午8点多钟，才把敌人等到。我们屏住气观察着、计算着，一个团过去了，又一个团过去了，眼看过去了3个多团，却仍然不见敌人的指挥机关。这种情况使我们不免有些焦急。原来侦察是3个团，现在过去了这么多仍不见指挥部到来，敌人兵力是大大超过原来的估计了，但是战斗又非打不行，只有盼着敌指挥机关早些到来。等到下午1点多钟，大路上渐渐热闹起来，敌人的行军序列越来越杂乱，有骑马的，有乘滑竿的，还有骡马、担架、挑子……大概是烟瘾发作了吧，一个个脚步蹒跚、懒洋洋的，这便是我们预定的攻击对象，也正是我们预定的攻击时间。

“开始出击！”一排枪响，我军从树丛中一跃而出，向着敌群猛冲过去。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下，敌人顿时乱成一团，四处奔逃，指挥机关也被打乱。我7团、8团乘机猛冲，将敌人击溃，接着便跟踪猛追。正在这时，敌人先头一个团发现我兵力不多，便掉转头，向我左翼的8团反扑过来。我8团只有一部分部队投入追击，力量不足，难以将敌人击退。敌人步步紧追，渐渐迫近军团指挥部。情况一时变得非常紧张，幸好还有侦察连在。侦察连有180多人，武器好、战斗力强，于是立即将该连投入战斗，协同8团奋力反击，将敌人击溃。

黄昏时分，战斗全部结束。我军共缴获步枪1000多支，俘虏敌人1800多人。这次战斗胜利，使我们又一次体会到部队的战斗素质是多么可贵，正是大家奋勇作战，才使战斗获得胜利。

（作者时任红9军团参谋长，文章摘编自《来时的路：亲历者讲述红色故事》“强渡大渡河”卷，有删节）